

分类号
U D C

密级
编号 10741

兰州财经大学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研究生姓名: 李婉婷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王思文 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应用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研究方向: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西部产业发展

提交日期: 2024年5月31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李婉婷 签字日期： 2024.5.31

导师签名： 张君文 签字日期： 2024.5.31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 同意（选择“同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 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 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李婉婷 签字日期： 2024.5.31

导师签名： 张君文 签字日期： 2024.5.31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Candidate: Li Wanting

Supervisor: Wang Siwen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会议中强调,要把重点放在扩大内需上面,增强消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消费升级通过激发收入弹性效应、优化要素配置以及推动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影响。尽管我国持续想办法对产业进行调整,但各产业间的发展不均依旧明显,这无疑对我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了显著制约。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两年间的平均增速仅为3.9%,这一速度低于同期GDP平均增长5.1%的水平。从短期效应来看,国内疫情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在经济逐步复苏的过程中,消费恢复的步伐明显滞后于整体经济增长和供给端的恢复,这进一步凸显了提升消费动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本文探究消费升级如何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流通体系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就要建设高水平的流通体系。流通作为中间环节,一端连着生产,一端连着消费,可以使国内经济循环更加畅通、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而在新发展格局下的作用更加明显。本文通过梳理文献发现,流通效率可以通过对产业拉动效应和收入弹性效应的影响,从而起到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调节作用。因此,本文选择流通效率这一调节变量,对流通效率在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进行研究。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利用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其影响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不显著。消费升级可以通过收入弹性机制、要素配置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流通效率对消费升级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流通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强化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积极影响,但尚未在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发挥作用。最后针对促进消费、提高流通效率、重视产业间的协调与平衡等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消费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 流通效率

Abstract

At his 20th CPC meeting,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tressed that the focus should be on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nd enhancing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consump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sumption upgrading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y stimulating the elastic effect of income,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factors and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lthough China continues to find ways to adjust the industry, the uneven development among the industries is still obvious, which undoubtedly constitutes a significant restriction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n 2022, the average growth rate of total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was only 3.9% in two years, which is lower than the average GDP growth rate of 5.1% in the same period. From the short-term effect, the domestic epidemic has brought a considerable impact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gradual economic recovery, the pace of consumption recovery obviously lags behind the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recovery of the supply side, which further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and urgency of increasing consumption momentum. Therefor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consumption upgrading acts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stressed that the circulation system is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smooth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high-level circulation system. As an intermediate link, circulation is connected to production at one end and consumption at the other end, which can make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more smooth and form a unified domestic market, and play a more obvious role i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rough combing the literature,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 circulation efficiency can play a regulating role between consumption upgrading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pulling effect and income elasticity effect. Therefore, this paper selects the adjustment variable of circulation efficiency to study the regulating role of circulation efficiency in the influence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is paper adopts the fixed effect model and uses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1 to 2020 to conduct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its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concludes that consumption upgrading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lays no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onsumption upgrading can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rough the income elasticity mechanism, factor allocation mechanism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echanism. Circulation efficiency has a positive regulating effect on consumption upgrading and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irculation efficiency helps to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impact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it has not yet played a role between consumption upgrading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inally, specific and feasible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promoting consumption, improving circulation efficiency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coordination and balance among industries.

Keywords : Consumption upgra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Circulation efficiency

目 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3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4
1.2.1 研究思路.....	4
1.2.2 研究方法.....	4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5
1.3.1 研究内容.....	5
1.3.2 技术路线.....	7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8
1.4.1 创新点.....	8
1.4.2 本文的不足.....	8
2 文献综述	9
2.1 消费升级的研究.....	9
2.1.1 消费升级的内涵研究.....	9
2.1.2 关于消费升级的测度研究.....	10
2.2 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	10
2.2.1 关于产业结构升级内涵的研究.....	10
2.2.2 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研究.....	11
2.2.3 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	12
2.3 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13
2.4 相关研究评述.....	13
2.5 本章小结.....	14
3 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理论分析	15
3.1 理论基础.....	15

3.1.1 消费理论	15
3.1.2 产业结构演变理论	16
3.1.3 流通效率相关理论	17
3.2 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机制分析	18
3.2.1 收入弹性机制	18
3.2.2 要素配置机制	19
3.2.3 技术创新机制	19
3.2.4 流通效率调节机制	20
3.3 本章小结	21
4 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22
4.1 计量模型设定	22
4.2 变量选取	22
4.2.1 消费升级指标选取	22
4.2.2 产业结构升级指标选取	23
4.2.3 中介变量选取	26
4.2.4 调节变量选取	27
4.2.5 控制变量选取	28
4.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29
4.4 实证分析	30
4.4.1 基准回归模型	30
4.4.2 内生性检验	31
4.4.3 稳健性检验	33
4.4.4 异质性分析	35
4.5 机制检验	37
4.5.1 中介效应检验	37
4.5.2 调节作用检验	38
4.6 本章小结	40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5.1 研究结论	41

5.2 政策建议	41
5.2.1 刺激消费升级	41
5.2.2 提升流通效率	42
5.2.3 重视产业间的协调与平衡	44
参考文献	45
后记	51

1 绪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会议中强调，要把重点放在扩大内需上面，增强消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战略举措的深层意义在于，消费升级能够有力推动企业实现转型与升级，从而催生出更高质量的产品供给，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尽管我国持续采取措施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以及优化，但各产业间仍然存在明显的发展不均衡问题，这无疑对我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了显著制约。因此，必须将产业结构升级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通过深化改革与创新，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更为稳健、可持续的发展。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会议中强调，要把重点放在扩大内需上面，增强消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目前我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日益强烈。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人们消费的量的扩张上，更显著地体现在质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上。总体而言，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已经从简单的“有无”问题，转向了更高层次的“优劣”问题，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全方位的鲜明特点。从实物商品的购买到生活服务的需求，从线上购物的便捷到线下商场的体验，消费升级的趋势日益凸显。目前消费升级的内涵在学术研究中尚未统一。孙豪（2020）指出，在人们生活中的消费决策过程中，中高端消费的增加，以及对必需品的依赖的减少，是消费升级的体现。而一些研究则进一步细化了消费升级，将其划分为多个层次（毛中根、杨丽姣，2017）。本文借鉴了徐卓顺等（2022）的研究，将消费规模的指标用食品烟酒等七大类型人均消费总支出来表示，并将其中四大类型发展型消费的人均消费占整体的比重作为消费结构优化指标，运用熵值法分别得出规模和结构的权重，最后获得消费升级这一指标来评估消费升级程度。

消费升级通过改变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和消费方式，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消费升级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如高端制造业、现代服

务业等；另一方面，消费升级也能够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提高其附加值和竞争力。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变与升级。1978年一、二、三产业占比分别为27.7%、47.7%和24.6%，到2023年比重分别为7.1%、38.3%和54.6%。第一产业比重逐渐减少，而相对第一产业来说，二三产业变动比较平缓，但第三产业的份额在不断扩大。三大产业产值均在上升，但各产业间的发展不均依旧明显，这无疑对我国的经济构成了显著制约。另一方面，疫情的冲击也对我国经济造成了影响，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相较于经济形势的整体回升和供给的恢复，消费恢复的步伐显得相对迟缓。因此，本文深入探究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20年的中央财经会议上指出，国民经济的根本在于流通体系的稳固，而“十四五”规划纲要也将“强化流通体系支撑作用”作为一项重要目标。为了深入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并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必须致力于构建高效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这意味着既要促进要素供给的充分竞争，保障消费选择的多样性与自主性，又要加快建设一个商流、物流、信息流紧密联动的现代化流通体系，进而推动流通业的高水平发展。一个高水平的现代流通体系，对于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商贸流通业作为流通产业的关键组成部分，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更是连接消费者与商品服务、工农业生产企业的桥梁和纽带，直接关联着供给与需求两端。在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背景下，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水平对于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以及提升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流通作为中间环节，一端连着生产，一端连着消费，可以使国内经济循环更加畅通、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而在新发展格局下的作用更加明显（冯树辉、朱平芳，2022）。高效率的流通业对于制造业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不仅能激励其自主创新，进而助力其脱离产能过剩的困境，还有助于区域更加合理的分工布局，进而推动制造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宋则等，2010）。商品流通的本质在于实现商品价值，即从生产端顺畅流向消费端的过程。流通效率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涵盖流通成本、速度、时间以及资源消耗等多个维度（左秀平等，2023）。这一效率指标直接反映了流通价值实现的速率和能力（纪路宇、张弘，2021）。由于周转

时间是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的总和，且两者相互排斥，因此流通效率的高低成为评估流通体系质量的基础性指标（严金强、武艺扬，2023）。提高流通效率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有助于畅通双循环、构建现代化流通网络以及挖掘消费潜能（陈甬军等，2022）。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结构优化这两个维度来量化消费升级指数。在此基础上，设定了相应模型，以深入探究消费升级是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此外，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流通效率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以期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近年来，消费升级作为经济学界的热点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和研究。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已有前人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也已被众多学者所探讨。但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却少有人研究。本文通过梳理文献发现，流通效率可以通过对产业拉动效应和收入弹性效应的影响，从而起到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这一调节机制的分析，本文丰富了相关理论研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开拓了新思路。

（2）现实意义

在实用价值层面，消费无疑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核心环节。鉴于中国已全面完成脱贫摘帽任务，在新的征途中，深度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依靠内需拉动消费升级，是激发经济活力的新引擎。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疫情阴霾持续笼罩，逆全球化趋势日益凸显，导致全球产业链出现断裂，进而影响我国产业链的外部循环。因此，我国经济发展应更加注重以内循环为主体，以扩大内需为战略支撑，将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充分发挥消费作为经济“主引擎”的作用，促使居民有能力消费、有信心消费、有意愿消费。通过强化国内经济发展，降低对外部经济的依赖和潜在风险，确保经济稳定增长。为此，应密切关注消费升级的动态变化，精准测度产业结构升级的状况，明晰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深远影响，同时，结合时代背景，因地制宜提出针对性强、切

实可行的政策建议。本文旨在深入探究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这对于我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新发展格局顺利运行、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此外，对流通效率这一调节机制的探究，也为消费升级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选择。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1.2.1 研究思路

首先，通过系统查阅相关文献，深入理解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并对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进行全面分析。其次，搜集相关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等实证研究方法，对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1.2.2 研究方法

（1）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本文查阅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在阅读后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相应的整理归纳，了解目前该领域现有的研究进度和研究范围以及未涉及的或是未深入探讨的方向。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思路。另外，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和收集相关变量及其所需数据，进行定量分析。

（2）文献研究法与理论分析法

对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相关理论研究进行系统性梳理，以现有文献研究为基础，搭建本文的研究框架与研究思路。首先梳理了消费升级理论、产业结构升级理论以及流通效率相关理论，其次整理了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文献、消费升级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最后，提出了流通效率在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的理论机制。

（3）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

建立实证模型分析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一是面板数据分析法，面板数据综合时间和截面两个维度的数据特点，可以有效解决遗漏变量问题。考虑到数据结构特点和分析需求，本文测算中国 30 个省级层面的消费升级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二是调节效应分析法，调节变量指在解释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的变量。调节效应具体表现为因素 C 在 A 与 B 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一般会以交叉项的形式存在。本文从流通效率这一视角对消费升级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机制进行分析。

(4) 比较分析法

本文对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测算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探究了消费升级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地区异质性。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1.3.1 研究内容

第一部分：绪论。本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明确研究思路与方法，并概述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同时，指出可能的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通过对消费升级的内涵与测度方法、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测度手段及其影响因素的文献梳理，全面把握国内外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明确本文的研究切入点，为后续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提供支撑。

第三部分：理论分析。本部分介绍相关理论基础，深入剖析消费升级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制。具体包括收入弹性机制、要素配置机制、技术创新机制以及流通效率的调节作用。这些分析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第四部分：实证分析。本部分从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结构优化两个维度衡量消费升级，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指标来评价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同时，进行稳健性检验、内生性讨论和异质性分析，并检验收入弹性机制、要素配置机制、技术创新机制以及流通效率调节机制的作用。

第五部分：结论与政策建议。基于以上分析，本部分得出研究结论。并借助流通效率作为工具，提出促进消费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以期对相关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1.3.2 技术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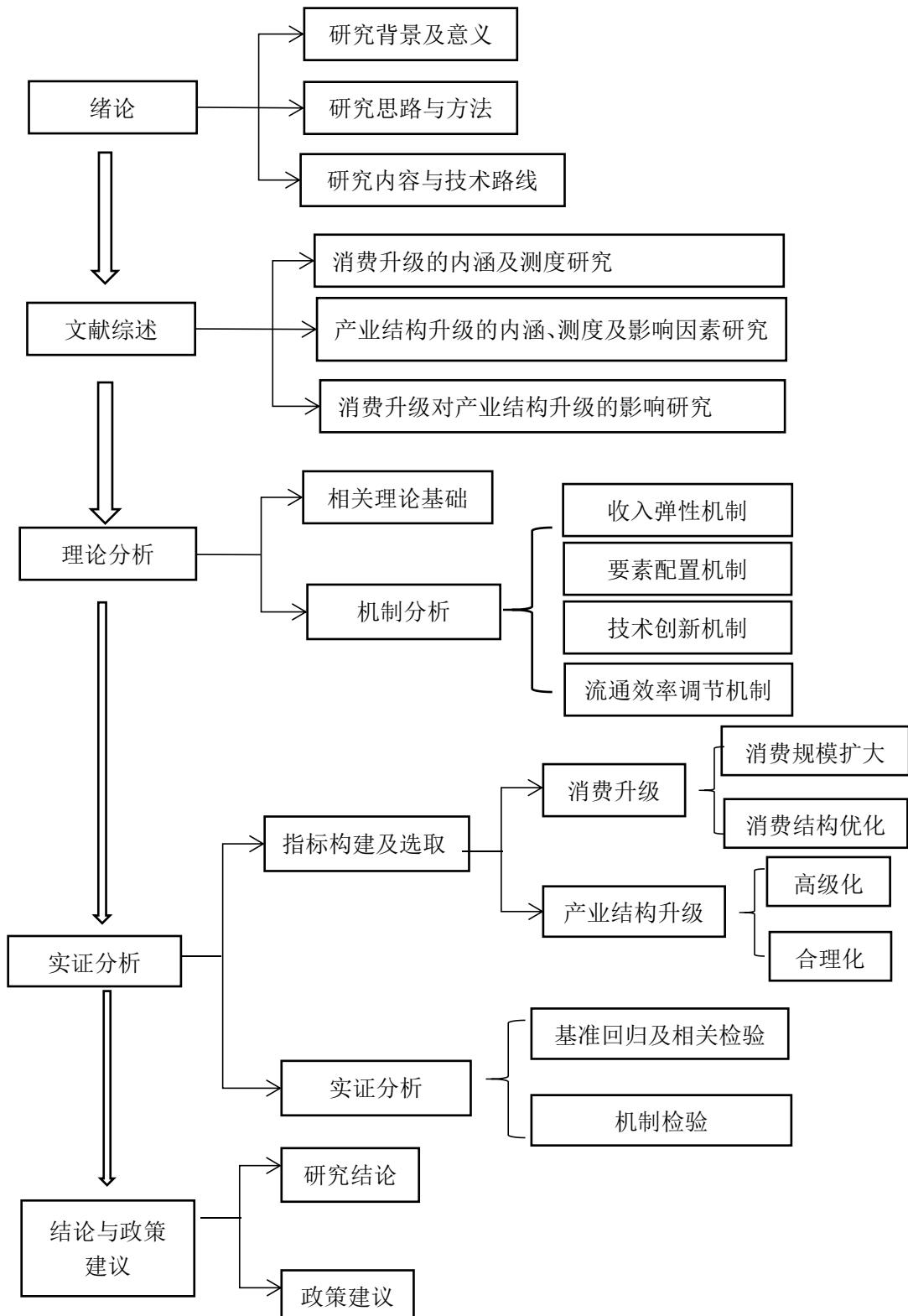


图1.1 论文研究框架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1.4.1 创新点

多数文献探讨了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但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却少有人研究。本文使用流通效率这一调节变量,对流通效率在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中起到的调节作用进行理论分析,并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调节作用,最后从流通业发展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因此本文视角及结论对于消费升级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这一研究以及我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及制定具有一定意义。

1.4.2 本文的不足

第一,相关文献综述不够充分,对现有研究的分析还不够全面和深入。第二,本文在消费升级的测度上,仅依据官方的八大类消费数据,这虽能展现一定的消费结构,却不能更进一步地进行分析,因而测度略显表面化,无法全面反映消费升级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因此,在后续研究中,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消费结构,以更准确地刻画消费升级的全貌。

2 文献综述

在过去，学者们已经对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部分将对这些研究进行全面的概述，包括消费升级的内涵及测度研究、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测度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和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并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述评，从而找准本文的切入点。

2.1 消费升级的研究

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日益增强，消费升级的趋势也日渐显著。鉴于消费升级这一概念深具中国特色，本文仅聚焦于国内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目前，关于消费升级的探讨已取得了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从以下几个维度对其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

2.1.1 消费升级的内涵研究

首先，消费升级的概念比较特殊，是在中国的语境下使用的，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李世美、狄振鹏（2020）认为，从刀耕火种的文明向蒸汽文明以及新工业文明的进化过程中，就是消费升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活不再受物质匮乏所限，消费的能力也得到提高。刘子兰、姚健（2018）将其看作是动态的，表现为水平、品质以及需求层级都更加高级。孙豪（2020）指出，在人们生活中的消费决策过程中，中高端消费的增加，以及对必需品的依赖的减少，是消费升级的体现。石明明等（2019）从结构上划分了两种类型的消费升级：一类消费升级表现为生存性消费，例如食品支出占比的下降，而二类消费升级则表现为服务性消费，例如家庭消费支出的上升。此外，还有学者的视角更为开阔，从多个维度丰富了消费升级的内涵，认为在方式上创新，也是消费升级的内涵之一（Jian et al, 2021）。由此可见，消费升级涵盖了方方面面，是一个内涵较为丰富的概念。黄隽、李冀恺（2018）也对其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包括消费升级的具体表现、如何度量消费升级、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促进消费更好升级等。

2.1.2 关于消费升级的测度研究

在现有文献中,对于消费升级指标的量化,学者们采用了多种不同维度的度量方法,这反映出测度方法尚未实现标准化。一些学者聚焦于消费不公平,采取了基尼系数等指标,对消费升级来进行量化(Giles, 2004; Fisher et al, 2015; Niño-Zarazúa et al, 2017)。潘锡泉(2019)强调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结构优化是消费升级的核心内容。徐卓顺等(2022)则采用熵值法计算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的权重,进而得出消费升级指数。石明明等(2019)指出,不能只考虑微观,还要在宏观上进行研究,这样测度才能更加客观综合,因此他将人们的消费水平也纳入考虑。此外,部分学者在衡量消费升级时,考虑了消费结构这一因素。举例来说,黄隽(2018)通过收入弹性大小来进行定义,如果商品的收入弹性值大于1,那么称其为高层次,并以在这些商品上面的消费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作为居民消费升级的度量指标。俞剑、方福前(2015)则利用家庭在三种不同品类上的消费比重来度量消费升级,并且对农村和城镇分别进行衡量。

2.2 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

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历史悠久,自二战以来,西方国家便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国内外学者主要聚焦于产业结构的演进与调整研究,然而,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接下来,本文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梳理。

2.2.1 关于产业结构升级内涵的研究

在探讨产业组织优化理论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回溯到国外的早期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William Petty (1690)首次提出了产业组织变动与社会劳动力流动相适应的观点,这为后续的产业组织研究奠定了基石。随后, Colin Clark (1940)参考了他的研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探讨。他注意到,当一个国家人均薪酬逐渐增加之后,产业的重点会发生变化。具体来说,起初产业的重心可能集中在第一产业,然后逐渐转向第二产业,最终会向第三产业倾斜。这种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被后人称为“配第一克拉克定理”。与此同时, Fisher(1935)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将经济部门划分为三大产业,这是首次按照经济运行过

程和原理来进行划分，并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位经济学家 Simon Smith Kuznets (1941) 进一步细化了分类，第一产业主要涵盖农业，第二产业以工业为主，而第三产业则主要指的是服务业。并通过大量的统计研究，为后续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持。而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Lewis (1954) 主要探讨了农业与工业之间并行不悖的关系，创造了二元经济模型。筱原三代平 (1957) 站在外贸的视角，探讨了产业是如何变迁的，他主张国家应重点关注比较弱小的工业，以促使它们转变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Hirschman (1958) 则强调了资源分配的重要性，特别是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应首要考虑那些效率高、与其他产业关联度大的部门。Rostow (1960) 进一步提出，每个占主导地位的部门随着时期的不同，其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而 Hollis Chenery (1989) 将工业发展划分为不同阶段，所依据的是内部生产这一理论。由此可见，国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产业的演变以及调整。而我国学者对此的研究起步较晚，起初主要借鉴国外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展开研究。近年来我国实证研究的趋势日渐增加，对产业结构的进一步深入。由于制造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对第二产业的关注也相对较多。

2.2.2 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研究

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多数研究使用两个维度，即高级化和合理化，分别进行了测度。然而，由于各自的理解不同，在指标的选取上存在着一些差异。对于高级化如何衡量的问题，潘文卿和陈水源 (1994) 在他们的研究中表明，不同产业间的技术水平存在差异，这是判断产业结构是否趋向高级的核心要素。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在技术上更先进、更高效，那么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水平也就更高。靖学青 (2005) 则选择了另一种方法，那就是通过计算不同行业间相关系数的大小，来评估高级化程度。一些研究者受研究资料所限，如周昌林 (2007) 选择了劳动生产率这一单一指标，作为评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主要指标。他通过对劳动生产率的加权计算，得出一个综合的数值，来反映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这种方法虽然简化了计算过程，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产业结构的优化情况。刘伟 (2008) 的研究则更为全面，他既考虑了“质”的方面，即各行业结构比例大小的调整和优化；又考虑了“数”的方面，即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韩永辉等（2017）用各产业部门产出占比和劳动生产率的乘积来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在衡量合理化方面，早期，Henri Theil（1967）基于劳动产出弹性的理论构建了泰尔指数，为后续的测度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在此之后，干春晖（2011）对该指数进行了改进，使其更能全面反映实际情况。此外，也有学者采取了与众不同的角度，例如潘文卿和陈水源（1994），他们将产业技术特征看做关键因素，因此在测度过程中，使用了结构偏离度这一指标。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制造业以及服务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些研究针对于特定行业展开了测度，使研究趋于精细。

2.2.3 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的相关研究中，黄乾和李竞博（2018）针对人口综合因素进行了评估，发现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而高级化的发展则呈现出一致性，服务化水平未见显著区别。此外，他们还观察到经济发达省份的人口活跃度较高，而东北三省和西北地区则相对较低。在控制其他社会经济变量后，他们发现人口活跃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影响。从地区层面来看，郭佳和扶涛（2015）等人以云南省为例，构建了一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评价体系，并深入探讨了我国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他们认为，社会需求、人口素质、技术进步以及劳动生产率是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黄天能、许进龙（2021）等通过实证分析，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行了量化研究，利用 24 座资源枯竭城市的面板数据，发现一些因素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如就业增加、政府支持水平提高、消费提升以及城市化水平提高，而固定资产投资则表现出负向影响。庞建刚和李思思（2023）聚焦于县城，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发现城镇化水平、科技创新潜力和城市空间因素均对区域耦合协调度产生积极影响，而政府干预和金融发展水平则呈现出负向效应。武晓霞（2014）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省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投资需求和政府消费需求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并不显著，而外贸规模、个人消费需求和人力资本虽然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所推动，但作用有限。相比之下，技术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更为显著且贡献较大。白云朴和李辉（2015）则针对资源型产业的优化升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分析了资源型

产业优化升级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并提出了从科技创新、环境保护、人力资本投入等角度推动产业升级的路径和机制。

2.3 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杨天宇和陈明玉（2018）从理论上阐述了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推动作用：一方面，通过增加高需求收入弹性产品，扩大其产业的占比，使产业更加高端；另一方面，发展高生产率产业，增加其比重，从而推动产业结构整体升级。这些研究表明，消费升级能够优化产业结构，促使其向中高端发展。张广柱（2019）通过实证研究对其中的影响路径进行了分析，发现消费结构调整之后，产品相对价值会改变，资源会更多地流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领域，推动这些产业的发展 and 壮大，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陈中耀和李坤（2019）关注了消费结构持续性，他们认为，为达到最佳状态，必须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与此同时要推动服务业市场化进程，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王玉梅和龚长兰（2019）研究了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转移的影响，结果显示消费升级能够推动工业结构优化，而企业模式的改变在这一过程产生了中介效应。在双循环的时代背景下，一些学者进一步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影响。潘海岚（2022）基于当前的时代背景，分为城镇和农村两个区域进行研究，探讨了消费升级对产业转型的影响。徐卓顺（2022）则探讨了空间效应，对二者之间的直接和间接效应进行了测度。测度结果显示，消费升级不仅直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还通过区域间的空间外溢效应对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产生了影响，但存在地域性差异。刘汝浩（2021）对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协同发展水平和互动效应进行了测度和检验，并引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探讨了技术创新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居民消费升级协同发展中的中介效应。

2.4 相关研究评述

已有大量文献对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思路。然而现有文献仍然存在着以下不足：关于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异质性的研究较少，对于二者之间影响的调节机制的研究仍存在探索的空间。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依照本文的理论逻

辑，使用计量模型探究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流通效率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数据支持和方法借鉴。

2.5 本章小结

本章对相关主题文献进行研究综述，包括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及测度研究、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测度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和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并对相关文献进行述评。帮助本文找准研究的切入点以及可能的创新方向。

3 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理论分析

本章探讨了研究的核心理论基础，包括消费理论、产业结构演变理论以及流通效率相关理论。并进一步剖析了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的理论机制。这些机制具体包括收入弹性机制、要素配置机制、技术创新机制以及流通效率调节机制。

3.1 理论基础

消费理论、产业结构演变理论以及流通效率相关理论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3.1.1 消费理论

(1) 马克思消费理论

在经济学领域，马克思不仅在研究生产方面取得了成就，还深入探讨了关于消费的问题。马克思的消费学说发端于 19 世纪，在 40 年代初现，50-60 年代有了雏形，70-80 年代成为体系。它的消费思想主要包括三点：首先，任何生产的核心目标均在于响应特定的消费需求，而正是这些需求驱动着生产力的持续提升。其次，产品只有被消费出去，才可以真正称其为产品，如果它只是被生产出来，不能被叫做完整意义上的产品。最后，生产服务于需求，而需求描绘的是人们内心的愿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在购买产品时，可能会期望满足更高需求，新的需求由此产生，刺激着厂商发展生产，因此，消费也能够催生生产。除此之外，马克思还指出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循环，在生产力飞速发展之后，劳动也更加高效，人们的闲暇变多，更多地进行消费，同时劳动素质也变得更高，从而带来下一环节的更高效的生产。

(2) 恩格尔定律

人们在生活水平提高、收入增加之后，对生活品质的考虑也会增加，人们不仅会扩大消费，其结构也会产生调整。早在 19 世纪，德国的 Ernst Engel 就对其进行了研究，他对欧洲居民消费支出结构进行分析，探究其如何受到居民收入影响。Engel 发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食品、衣着等基本支出比例会慢慢减小，

而文娱等享受型支出比例则在增大,这就是恩格尔定律。恩格尔系数也由此产生,它可以用来衡量居民生活质量。该系数通过计算食品支出占比来反映居民的消费结构的变动。

(3) 马斯洛需求理论

Abraham H. Maslow 以人类心理动机作为出发点,将人类需求归纳为五个不同的层级。他提出,需求的满足是一个由低到高,层层推进的过程。对于消费领域,这一理论表现为当生活水平达到人们的基本需求目标后,他们通常会向往更高的品质,进而引发支出结构的调整。而这种行为,实则是人们追求幸福感的说明。美国学者 Paul A. Samuelson 则基于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幸福的量化方法,即幸福等于效用除以欲望。因此,消费的升级,实际上是人类为了提高自身幸福感所体现的一种行为模式。这也为恩格尔定律也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1.2 产业结构演变理论

(1) 配第-克拉克定理

William Petty (1960) 认为,各国公民之所以收入和经济情况参差不齐,有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产业结构存在差异。他研究得出,相比于其他两个产业,工业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增量。Colin Clark (1940) 参考前人的研究进行产业分类,探索劳动力在三大产业间的流动模式。他发现,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劳动力流动的规律呈现出一种趋势:起初,劳动力会从第一产业逐步向第二产业转移;随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力又会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这一发现,后来被广泛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该定理是本文选取衡量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重要依据,因此在测度中将劳动力因素纳入考虑。

(2) 人均收入影响论

Simon Smith Kuznets (1941) 对总产值和就业人口的变动规律进行了考察,进而揭示了产业结构总体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动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第一产业的收入份额逐渐下降,同时其在总劳动力中的占比也在不断减少;第二产业虽然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有所增加,但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几乎保持不变或略有增强;而第三产业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虽然略有上升,但变动并不稳定,然而其在总劳动力中的占比却呈现出持续增大的趋势。该理论是配第

-克拉克定理的进一步证明，对于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关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指标着重考虑了产业产值的变化，产业结构合理化这一指标综合考虑了产业产值以及就业人口的比重。

（3）主导产业理论

Rostow（1960）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六阶段论，他强调，在每个阶段中，都有相应的主导产业在推动发展。主导产业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能够依托科技进步或创新，引入新的生产函数。因此主导产业需要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和研发，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第二，能够形成持续高速的增长率。主导产业通常具有强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能够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支撑作用。第三，具有较强的扩散效应，对其他产业乃至所有产业的增长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主导产业通过前向关联效应、后向关联效应以及旁向关联效应，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的增长。随着技术发展和市场变化，主导产业会不断变换，这是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鲜明标志，由此产生了产业结构升级，而这成为了实现经济跨越的核心动力。伴随着人们消费需求层次的提升，中国需要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培育主导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发展。该理论为本文探索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关系奠定了基础。

3.1.3 流通效率相关理论

商品价值的实现是商品流通的本质，即商品经济由生产端到消费端的运行过程。因此，流通效率是一个复合型概念，有着多元的内涵。流通效率具体包括流通的成本、流通的速度、流通的时间及资源消耗等多个方面（左秀平等，2023）。流通效率是衡量流通价值实现速度与能力的直接指标（纪路宇、张弘，2021）。周转时间由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共同构成，而这两者之间存在相互排斥的关系。因此，流通效率的高低成为评价流通体系质量的核心依据（严金强、武艺扬，2023）。提高流通效率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有助于畅通双循环、构建现代化流通网络以及挖掘消费潜能（陈甬军等，2022）。

构建现代流通体系是提升流通效率的关键所在（曹海苓，2023）。学界与各界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便是通过优化流通效率来推动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的完善

（张敏、李艳，2023）。流通业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改善民众生活，而且在响应高质量发展的号召下，必须构建更为健全的流通体系，进而实现流通效率的显著提升（杨向阳等，2023）。流通体系的变革对于提升流通效率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构成流通效率改进的重要一环（刘海建、胡化广，2023）。流通体系作为纽带，连接着生产与消费，其效率在数字经济助力下得到显著改善，成本亦有所降低，这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共同富裕的步伐。流通效率在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效率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丁华、丁宁，2023）。

3.2 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机制分析

本节分析了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收入弹性机制、要素配置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以及流通效率调节机制，并提出相关研究假设，为后续中介效应以及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提供了理论基础。

3.2.1 收入弹性机制

消费升级是收入稳步提高的体现。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的提升，人们对于食品等生存必需品的消费减少，而发展型等支出会增加，也就是说，会更多购买收入弹性大的商品。而供给侧通过市场这一媒介接收到这种消费上的转变，进而不仅能够促使相关产业蓬勃发展，还可能推动其成为主导产业（杨天宇、陈明玉，2018）。以第二产业为例，随着居民购买力的增加，在电子产品等高技术产品上的消费日渐扩大，这进一步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地位提升，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走向更加智能化的未来；而对于第三产业，居民购买力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文娱、教育等高品质服务的消费，同时有助于激发对房地产及金融等领域的投资热情，这也成为了行业内部提供更高服务质量、从而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催化剂。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 1：消费升级可以使对高需求收入弹性产品的需求增加，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3.2.2 要素配置机制

上述机制以生产后作为切入点探讨了影响机理,而要素配置机制更加关注生产中的问题。根据马克思消费理论,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需求。经济学中有一个理性人假说,在这种前提下人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基于此,理性的企业家在生产决策时,不仅会参考以往的产品生产情况,以此来计划当期所需的生产数量,从而使生产规模与结构更加合理;还会敏锐捕捉市场信息,掌握最新动向,以便于使生产更精准满足市场需求,甚至引领新的消费风尚,催生新的产品和服务,塑造需求新格局,通过改善质量、优化性能等举措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简而言之,市场上需求信息的更新不仅促使企业调整原有计划,还对其有着激励作用,推动创新。当购买者增加对更高层次产品的购买时,这相当于给了市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中高端产业具有更大的利润空间。在利益导向下,企业捕捉到这一市场信号之后,会转移生产要素,将其向中高端产业倾斜,这不仅可以促进新旧动能转换,还鼓励了中高端增加生产,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龙少波等,2020)。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 2:消费升级可以推动生产要素向中高端产业集聚,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3.2.3 技术创新机制

科技的作用至关重要,它为现代经济赋能,为生产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技术这一生产要素,其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逐渐超越传统要素。技术可以使产品拥有高附加值,并且在生产过程中,这一生产要素的回报率相对也比较高。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在实现产业转型过程中,对科技方面大力投入。消费需求的变迁不仅推动了市场的繁荣,更对企业技术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随着居民消费层次的提升,对企业的期待也日益增强。为应对消费者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企业必须不断深化技术创新和工艺升级,从安全性、环保性、智能性等多个维度提升产品品质,确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那些无法适应市场变化、满足消费者高品质需求的产业,将逐渐被市场淘汰,而这一过程正是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驱动力(刘汝浩,2021)。新兴产品和服务

务不仅催生了新兴产业的诞生和崛起，占据了市场份额，还使得对传统商品的消费下降，由此引发了导致部分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吸纳劳动力能力减弱。而科技创新使其产生协同效应，推动了新兴经济的出现，并一点点替代传统产业，成为经济的支柱，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 3：消费升级可以激励厂商进行产品技术创新，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3.2.4 流通效率调节机制

流通效率通过对产业拉动效应和收入弹性效应的影响，从而起到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调节作用。

（1）流通效率对产业拉动效应的调节作用

在微观层面，厂商为迎合消费升级趋势，会进行更多的科技投入，改变其策略，进而使要素配置更加合理，使生产结构和规模更加适应市场需要。从宏观角度来说，消费升级同样促进了要素流动，只不过这种流动不再是企业内部，而是由低端转移至中高端行业，推动产业更加合理布局，从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同时，现代流通体系能够整合商品及资源，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可以拓宽商品流通途径，使过程中的损耗降低，让供给和需求更加匹配。这也对更高的效率提出了要求（宋则等，2010）。流通效率的提升不仅能够充分使各种生产要素更有活力，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使供求更能匹配，还能加快交易速度，进而显示流通业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指导生产和扩大消费方面，从而助推高质量发展。（孔庆景，2023）。此外，流通效率的提升也将促进生产要素和商品资源在国内市场的顺畅流通，为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有力支撑（陈锦然等，2022）。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 4：提升流通效率，有利于加速生产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发挥产业拉动效应，从而起到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调节作用。

（2）流通效率对收入弹性效应的调节作用

消费升级的核心在于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进而通过收入弹性的作用机制，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消费升级不仅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还能反哺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进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随着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的增长，消费结构也将发生深刻变化。根据边际消费理论，高收入群

体对消费增长的贡献度有限，而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的提升将显著提升对需求收入弹性较高的消费品的需求，从而引导企业进行生产调整，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市场经济中的流通过程是商品交换关系的集中体现，关乎商品价值及其背后不同所有者经济利益的实现与协调，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重要影响。流通业的发展不仅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助推国民收入增加，进而推动劳动报酬的增长，还能通过带动社会就业，直接增加劳动收入（谢莉娟等，2023）。提升流通效率，有利于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范围（刘海建、胡化广，2023），从而扩大收入弹性效应。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 5：提升流通效率，有利于扩大收入弹性效应，从而起到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调节作用。

3.3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并分析了消费升级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制：收入弹性机制、要素配置机制、技术创新机制和流通效率调节机制。为下文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4 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章介绍了本文的计量模型设定、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并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机制检验。

4.1 计量模型设定

为验证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本文构造如下实证模型：

$$S_{it} = \alpha_1 + \alpha_2 CS_{it} + \alpha_3 X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i 表示地区， t 表示年份，采用2011-2020年中国除西藏外的30个省区面板数据。 S 是反映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本文分别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S_1 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 S_2 两个维度进行度量。 CS 是表征消费升级的指标， X 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 gdp ，金融发展水平 fin ，对外开放程度 $open$ ，公共基础设施水平 $infrastr$ 和财政支出水平 $fisc$ 。 μ_i 为各省份的个体固定效应， δ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表示干扰项。

4.2 变量选取

4.2.1 消费升级指标选取

消费升级主要包含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两个方面（潘锡泉，2019），本文借鉴了徐卓顺等（2022）的研究，将消费规模的指标用食品烟酒等七大类型人均消费总支出（简称人均消费总支出）来表示，并将其中四大类型发展型消费的人均消费占人均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作为消费结构指标。并使用熵值法得出规模和结构的权重分别为0.731和0.269，最后获得消费升级指标，该指标用 CS 表示。消费升级的指标体系构建见表4.1。消费升级的测度结果见表4.2。

表 4.1 消费升级指标体系构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消费升级	消费规模	食品烟酒等七大类型人均消费总支出
	消费结构	(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人均消费支出)/人均消费总支出

表 4.2 消费升级测度结果

地区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北京	0.54	0.58	0.63	0.66	0.64	0.64	0.69	0.70	0.75	0.61
天津	0.33	0.36	0.31	0.35	0.39	0.46	0.49	0.57	0.61	0.49
河北	0.16	0.18	0.18	0.23	0.25	0.27	0.31	0.31	0.34	0.34
山西	0.13	0.14	0.19	0.22	0.27	0.30	0.32	0.33	0.37	0.33
内蒙古	0.22	0.27	0.26	0.30	0.33	0.35	0.38	0.40	0.42	0.37
辽宁	0.21	0.26	0.30	0.27	0.31	0.40	0.43	0.45	0.46	0.37
吉林	0.16	0.20	0.27	0.27	0.28	0.33	0.33	0.38	0.41	0.34
黑龙江	0.14	0.16	0.20	0.21	0.25	0.30	0.31	0.35	0.39	0.31
上海	0.54	0.58	0.61	0.67	0.57	0.63	0.66	0.75	0.80	0.68
江苏	0.31	0.36	0.33	0.37	0.38	0.41	0.44	0.44	0.48	0.43
浙江	0.40	0.42	0.33	0.39	0.42	0.48	0.48	0.52	0.58	0.53
安徽	0.16	0.17	0.17	0.15	0.19	0.25	0.27	0.27	0.33	0.30
福建	0.23	0.26	0.22	0.24	0.27	0.29	0.31	0.34	0.38	0.35
江西	0.12	0.13	0.16	0.12	0.17	0.19	0.20	0.27	0.31	0.30
山东	0.13	0.15	0.17	0.22	0.27	0.31	0.35	0.39	0.42	0.43
河南	0.15	0.18	0.21	0.18	0.21	0.23	0.26	0.29	0.33	0.29
湖北	0.12	0.15	0.18	0.18	0.24	0.28	0.30	0.37	0.42	0.31
湖南	0.18	0.21	0.20	0.26	0.28	0.34	0.38	0.41	0.44	0.43
广东	0.32	0.35	0.26	0.31	0.35	0.40	0.42	0.43	0.50	0.45
广西	0.16	0.18	0.22	0.14	0.17	0.20	0.25	0.31	0.35	0.29
海南	0.11	0.14	0.17	0.16	0.20	0.23	0.27	0.28	0.35	0.50
重庆	0.14	0.15	0.14	0.18	0.24	0.29	0.34	0.37	0.40	0.40
四川	0.11	0.14	0.18	0.18	0.22	0.23	0.29	0.31	0.36	0.38
贵州	0.09	0.12	0.17	0.17	0.19	0.22	0.25	0.27	0.29	0.30
云南	0.10	0.11	0.15	0.18	0.18	0.18	0.22	0.29	0.29	0.33
陕西	0.17	0.20	0.23	0.26	0.27	0.32	0.33	0.36	0.38	0.36
甘肃	0.08	0.13	0.13	0.15	0.17	0.24	0.27	0.25	0.28	0.28
青海	0.13	0.17	0.17	0.21	0.29	0.30	0.34	0.36	0.35	0.38
宁夏	0.16	0.20	0.24	0.27	0.31	0.38	0.39	0.40	0.44	0.38
新疆	0.12	0.13	0.21	0.19	0.24	0.30	0.34	0.33	0.35	0.31

由表 4.2 可知,各省份消费升级水平差异较大,并且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上海、北京、浙江、天津、广东五个省份,在各年份地区之中消费升级水平位居

前列；海南、四川、云南、贵州、甘肃五个省份，在各年份地区之中消费升级水平较低。

4.2.2 产业结构升级指标选取

(1) 产业结构高级化

信息时代催生了服务业快速发展，这标志着了产业结构走向高级化。必须清楚这样的典型事实，即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产业的增速要快于第二产业（吴敬琏，2008），因此本文在选取高级化指标时，参考于春晖等（2011）的研究，借助三产与二产的产值之比来衡量高级化水平。该指标能够直观显示经济的服务化倾向，同时很容易了解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当该指标上升，可以表明经济走向服务化，同时产业结构更加高级化。在本文中高级化水平表示为 S_1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测度结果见表 4.3。

表 4.3 产业结构高级化测度结果

地区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北京	3.79	3.90	4.03	4.14	4.57	4.77	4.89	5.02	5.23	5.24
天津	1.12	1.15	1.22	1.27	1.39	1.59	1.69	1.73	1.80	1.81
河北	0.82	0.85	0.89	0.92	1.02	1.06	1.15	1.26	1.35	1.33
山西	0.53	0.61	0.69	0.78	1.13	1.19	1.07	1.15	1.16	1.16
内蒙古	1.01	0.98	1.01	1.06	1.15	1.18	1.26	1.27	1.27	1.20
辽宁	0.73	0.80	0.87	0.99	1.18	1.36	1.38	1.37	1.39	1.43
吉林	1.26	1.26	1.29	1.29	1.28	1.38	1.46	1.49	1.52	1.48
黑龙江	0.68	0.74	0.79	0.95	1.29	1.48	1.66	1.78	1.85	1.95
上海	1.43	1.59	1.78	1.91	2.18	2.47	2.44	2.47	2.72	2.79
江苏	0.82	0.86	0.92	0.97	1.02	1.09	1.09	1.11	1.17	1.20
浙江	0.86	0.92	0.96	0.96	1.03	1.10	1.17	1.21	1.30	1.37
安徽	0.76	0.77	0.80	0.84	0.98	1.07	1.14	1.23	1.27	1.29
福建	0.76	0.76	0.76	0.75	0.81	0.87	0.94	0.93	0.98	1.03
江西	0.62	0.65	0.67	0.70	0.80	0.90	0.95	1.07	1.09	1.12
山东	0.77	0.83	0.90	0.95	1.03	1.11	1.16	1.24	1.32	1.37
河南	0.64	0.69	0.74	0.78	0.84	0.91	0.94	1.07	1.13	1.20
湖北	0.79	0.79	0.90	0.94	1.01	1.06	1.14	1.19	1.22	1.44
湖南	0.86	0.88	0.92	0.96	1.04	1.16	1.29	1.39	1.35	1.34
广东	0.93	0.99	1.03	1.04	1.11	1.22	1.28	1.32	1.39	1.43
广西	0.96	1.04	1.16	1.17	1.27	1.37	1.43	1.48	1.53	1.62
海南	1.72	1.82	2.19	2.21	2.28	2.50	2.55	2.73	2.92	3.13
重庆	1.05	1.02	1.02	1.01	1.08	1.16	1.22	1.29	1.35	1.33

续表 4.3

地区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四川	0.82	0.85	0.87	0.94	1.02	1.17	1.31	1.40	1.42	1.45
贵州	1.18	1.16	1.20	1.20	1.21	1.22	1.33	1.40	1.43	1.45
云南	1.13	1.12	1.19	1.24	1.35	1.46	1.56	1.53	1.50	1.50
陕西	0.69	0.69	0.72	0.75	0.88	0.95	0.95	0.97	1.02	1.12
甘肃	0.88	0.93	1.00	1.06	1.32	1.46	1.57	1.60	1.68	1.76
青海	1.20	1.18	1.22	1.28	1.37	1.35	1.28	1.27	1.29	1.34
宁夏	0.91	0.96	1.00	1.03	1.10	1.15	1.10	1.17	1.19	1.22
新疆	0.77	0.87	1.03	1.05	1.29	1.37	1.35	1.39	1.47	1.47

由表 4.3 可知,各省份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差异较大,并且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北京、海南、上海、天津、吉林五个省份,在各年份地区之中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位居前列;辽宁、陕西、河南、江西、山西五个省份,在各年份地区之中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低。

(2) 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一个重要概念,体现了产业间的配合能力,以及聚合质量。它不仅体现了产业的协同程度,还能够说明资源是否得到合理利用。目前许多研究运用逆向指标,比如结构偏离度等来衡量合理化,对于这种方法来说,如果数值越大,则合理化水平越低。本文出于统一形式以便比较分析的考虑,借鉴了龙少波等(2022)的研究,对结构偏离度指标合理改进并利用各产业的产值比重来赋权,计算公式为:

$$S_2 = \sum_{i=1}^3 \left(\frac{Y_i}{Y} \right) \left| \left(\frac{Y_i}{L_i} / \frac{Y}{L} \right) - 1 \right| \quad (2)$$

其中, i 表示产业, Y_i 表示 i 产业的产值, Y 表示总产值,用于衡量产出结构; L_i 表示 i 产业就业人数, L 表示总就业人数,用于衡量就业结构。 S_2 的值越大,说明产业结构越趋于协调合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测度结果见表 4.4。

表 4.4 产业结构合理化测度结果

地区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北京	-0.10	-0.06	-0.05	-0.05	-0.06	-0.06	-0.06	-0.06	-0.06	-0.04

续表 4.4

地区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天津	-0.10	-0.09	-0.08	-0.08	-0.08	-0.07	-0.07	-0.07	-0.07	-0.05
河北	-0.41	-0.38	-0.36	-0.36	-0.35	-0.33	-0.31	-0.28	-0.27	-0.19
山西	-0.83	-0.70	-0.57	-0.58	-0.43	-0.39	-0.43	-0.42	-0.42	-0.36
内蒙古	-0.77	-0.68	-0.62	-0.59	-0.56	-0.55	-0.55	-0.55	-0.57	-0.63
辽宁	-0.58	-0.53	-0.41	-0.35	-0.34	-0.37	-0.38	-0.40	-0.41	-0.36
吉林	-0.58	-0.60	-0.60	-0.62	-0.63	-0.64	-0.64	-0.64	-0.63	-0.63
黑龙江	-0.93	-0.70	-0.69	-0.57	-0.35	-0.33	-0.29	-0.30	-0.28	-0.24
上海	-0.03	-0.06	-0.04	-0.05	-0.09	-0.12	-0.08	-0.07	-0.03	-0.14
江苏	-0.22	-0.21	-0.20	-0.19	-0.18	-0.17	-0.16	-0.15	-0.14	-0.13
浙江	-0.16	-0.14	-0.13	-0.12	-0.10	-0.09	-0.10	-0.09	-0.10	-0.10
安徽	-0.61	-0.55	-0.49	-0.45	-0.40	-0.38	-0.37	-0.37	-0.37	-0.26
福建	-0.29	-0.27	-0.25	-0.25	-0.24	-0.23	-0.22	-0.24	-0.26	-0.28
江西	-0.54	-0.50	-0.47	-0.43	-0.33	-0.29	-0.27	-0.24	-0.22	-0.19
山东	-0.48	-0.44	-0.41	-0.38	-0.36	-0.34	-0.33	-0.31	-0.29	-0.27
河南	-0.59	-0.56	-0.51	-0.48	-0.42	-0.37	-0.34	-0.30	-0.28	-0.26
湖北	-0.80	-0.79	-0.70	-0.63	-0.58	-0.53	-0.50	-0.47	-0.45	-0.30
湖南	-0.63	-0.62	-0.61	-0.61	-0.60	-0.57	-0.55	-0.54	-0.53	-0.27
广东	-0.25	-0.22	-0.20	-0.18	-0.16	-0.15	-0.14	-0.12	-0.11	-0.10
广西	-0.77	-0.77	-0.74	-0.72	-0.67	-0.57	-0.51	-0.44	-0.38	-0.30
海南	-0.57	-0.51	-0.38	-0.36	-0.34	-0.31	-0.31	-0.29	-0.27	-0.24
重庆	-0.52	-0.47	-0.41	-0.38	-0.35	-0.31	-0.30	-0.30	-0.28	-0.29
四川	-0.59	-0.57	-0.56	-0.53	-0.50	-0.46	-0.43	-0.42	-0.40	-0.37
贵州	-1.62	-1.48	-1.35	-1.19	-1.06	-0.70	-0.56	-0.49	-0.42	-0.34
云南	-1.23	-1.14	-1.05	-0.98	-0.92	-0.86	-0.77	-0.70	-0.65	-0.58
陕西	-0.60	-1.14	-1.01	-0.96	-0.89	-0.85	-0.85	-0.91	-0.92	-0.52
甘肃	-1.40	-1.33	-1.24	-1.18	-1.06	-1.00	-0.95	-0.92	-0.88	-0.60
青海	-0.51	-0.47	-0.47	-0.46	-0.45	-0.46	-0.41	-0.41	-0.40	-0.35
宁夏	-0.98	-0.86	-0.72	-0.59	-0.52	-0.49	-0.45	-0.41	-0.39	-0.37
新疆	-1.04	-0.96	-0.80	-0.81	-0.72	-0.71	-0.71	-0.75	-0.63	-0.60

由表 4.4 可知,各省份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差异较大,并且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五个省份,在各年份地区之中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位居前列;宁夏、新疆、云南、甘肃、贵州五个省份,在各年份地区之中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较低。

4.2.3 中介变量选取

高端产品销售情况 (tecenco)。收入弹性机制指的是消费升级使得高收入弹

性产品的需求增加,从而拉动和促进产业升级。高收入弹性的产品往往是非生存必需且附加值较高的高端产品,产品需求反映到市场层面可以是产品的销售情况,本文借鉴龙少波、丁点尔(2022)的研究,采用高技术产业产品的营业收入占工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作为测度指标,以检验收入弹性机制。

高端产业就业水平(tecpeo)。要素配置机制指的是消费升级促使厂商优化要素配置结构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为例,采用高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占第二产业比重比作为测度指标,以检验要素配置机制。

产业技术创新水平(tecmark)。技术创新机制指的是消费升级促使厂商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本文借鉴潘雄锋等(2023)的研究,采用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的比重作为测度指标,以检验技术创新机制。

4.2.4 调节变量选取

对流通效率进行测度,一类主要尝试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林翊和吴碧凡,2017),通常采用因子及主成分分析方法。还有一部分学者利用数据包络分析,将流通效率的指标用商贸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来代替(孙畅和吴立力,2017)。本文参考冯树辉、朱平芳(2022)的做法,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流通效率进行测算,用tfpch来表示。

该方法在测算时,流通效率可以用DEA-Malmquist指数来代替。如果将第t期技术水平看做依据,Malmquist指数可以这样表示:

$$M_{i,t} = \frac{d_{i,t}(X_{i,t+1}, Y_{i,t+1})}{d_{i,t}(X_{i,t}, Y_{i,t})} \quad (3)$$

根据上式, $M_{i,t}$ 代表t期技术水平下,t期与t+1期之间技术效率的增减; $X_{i,t}$ 表示第i个单位于第t期的要素投入; $Y_{i,t}$ 表示第i个单位于第t期的产出; $d_{i,t}(X_{i,t}, Y_{i,t})$ 为距离函数,它的公式为:

$$d_{i,t}(X_{i,t}, Y_{i,t}) = \min(\theta (X_{i,t+1}, Y_{i,t+1} \in C_{i,t})) \quad (4)$$

鉴于DEA方法的核算方式,下一步是确定流通业的投入产出指标。在产出指标方面,本文遵循封永刚(2022)的研究,选择增加值作为衡量我国商贸流通

业的产出指标,并使用省级层面第三产业增加值平减指数对商贸流通业的产出指标进行不变价(以2000年价格为基期)处理。对于投入指标,遵循现有研究,本文同样选择劳动和资本存量作为投入要素。在劳动投入指标方面,本文使用商贸流通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与城镇私营企业、个体就业人数的总和衡量劳动投入。对于资本投入指标,采取永续盘存法对资本存量进行度量,公式为:

$$K_i^t = (1 - \delta)K_i^{t-1} + I_i^t \quad (5)$$

其中, K 为资本存量, I 为固定资本投资额, δ 为折旧率。使用永续盘存法对资本存量进行核算时,需对基期的资本存量进行确定,本文选择陈昌兵(2014)的方法,使用资本产出比的方法,即假设1978年中国第二产业的资本存量占全国资本存量的比例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例相同,以此确定基期资本存量。因此本文借助基期商贸流通业的增加值,确定基期的资本存量,其中省级层面商贸流通业的基期资本产出比值参照单豪杰(2008)的研究进行设定。在此基础上,对商贸流通业的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额进行衡量。在折旧率的设定方面,参照王明雁等(2021)的研究,将其设定为5%。另外,使用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平减指数对资本存量进行价格调整。

4.2.5 控制变量选取

出于使回归结果更加稳健的考虑,本文选取相关控制变量,排除潜在因素的干扰。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gdp)、金融发展水平(fin)、对外开放程度($open$)、公共基础设施水平($infr$)和财政支出水平($fisc$)。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当地产业结构升级程度密切相关,尤其是生产效率高的产业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魏滨辉等,2023),为此,本文将经济发展水平纳入控制变量,采用经济发展水平(平减人均GDP)取对数来衡量。

财政支出可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政府可以通过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促进资源合理流动,最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龙少波、丁点尔,2022)。为此,本文将财政支出水平纳入控制变量,通过各省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

金融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金融发展水平反映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程度（冯树辉、朱平芳，2022），为此，本文将金融发展水平纳入控制变量，通过各省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

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增长，对外开放水平已成为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魏滨辉等，2023），为此，本文将对外开放程度纳入控制变量，采用各省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

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正外部效应，通过地区分工合作和产业集聚，提升各地生产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区域产业升级（龙少波、丁点尔，2022）。为此，本文将公共基础设施水平纳入控制变量，采用单位面积公路里程作为测度指标。

4.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的数据为全国 30 个省份在 2011-2020 年共 10 年的数据。鉴于数据可得性，不含西藏、台湾省的数据。数据的来源主要是各省的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等。由于流通效率是用 DEA-Malmquist 指数法进行测度，计算的是 t 期到 t+1 期的变化，因此没有第一年的数据，所以观测值为 270。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4.5。

表 4.5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符号	观测值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消费升级	CS	300	0.307	0.135	0.106	0.724
产业结构高级化	S1	300	1.323	0.717	0.629	4.958
产业结构合理化	S2	300	-0.460	0.289	-1.377	-0.0369
流通效率	tfpch	270	0.979	0.148	0.669	1.750
经济发展水平	gdp	300	9.320	0.460	8.653	10.66
金融发展水平	fin	300	3.230	1.137	1.661	7.585
对外开放程度	open	300	0.266	0.293	0.0168	1.403
公共基础设施水平	infr	300	2.710	0.360	1.413	3.250
财政支出水平	fisc	300	0.264	0.113	0.121	0.723
高端产品销售情况	tecenco	300	0.100	0.0748	0.00231	0.366

续表 4.5

变量名称	符号	观测值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高端产业就业水平	tecpeo	300	0.0456	0.0368	0.00365	0.151
产业技术创新水平	tecmark	300	0.152	0.255	0.00264	1.500

4.4 实证分析

本节对消费升级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进行了内生性检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

4.4.1 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检验结果见表 4.6。结果显示，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一列，核心解释变量 CS 的回归系数为 0.806，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该回归系数表明，消费升级水平每提高 1 个单位，则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提高 0.806 个单位。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说明从三大产业结构的比例份额变化动态来看，消费升级为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提供了动力。在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以后，社会生产力得到显著提高，经济迅速腾飞，同时积极扩大内需，人们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更加强烈，人们的需求更加丰富和个性化，精神上的需求也逐渐增加，多种服务业也因此蓬勃兴起，从而助推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第二列，核心解释变量 CS 的回归系数为 0.288，说明消费升级虽未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但与其具有正相关性。产业结构合理化不仅体现了产业间的协调与否，还能够说明资源的利用情况。消费升级对合理化的作用不显著，或许是因为没有起到对产业关联的促进作用，因而没能优化资源配置，这产生的消极作用抵消了其对合理化的积极影响，因而不能明显起到带动作用（潘海岚等，2022）。这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问題，产业结构还有待调整。

表 4.6 基准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1)	(2)
	S ₁	S ₂
CS	0.806*** (4.00)	0.288 (1.54)
gdp	0.223 (1.65)	0.390*** (3.11)
fin	0.119*** (3.41)	0.046 (1.43)
open	-0.771*** (-8.22)	0.384*** (4.41)
infr	-0.078 (-1.18)	0.431*** (7.02)
fisc	2.324*** (7.53)	0.733** (2.56)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00	300
R ²	0.984	0.917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4.4.2 内生性检验

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从而导致回归结果有误。消费升级通过收入弹性机制、要素配置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龙少波、丁点尔，2022）。而产业结构升级使得资源配置不断优化，产品研发和生产逐渐向高端化方向发展，推动消费者收入不断提高，引导居民消费从满足最基本生活向更高层次转变，从而带动消费升级（祁艳艳等，2022）。因此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即 2SLS 缓解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参考 Head and Mayer（2006）以及刘修岩等（2007）的方法，通过构建各省份地理中心度指标

(gc) 作为衡量各省面临全国市场消费升级水平的工具变量，其计算公式为： $gc = \ln \sum_{j \neq i} d_{ij}^{-1}$ ，即一个省份（自治区、市）与其他省份（市、直辖市）距离倒数之和的自然对数。由于该变量是不随时间变化的量，为体现动态特征参考陈启斐和吴金龙（2020）的做法，采用 2011-2020 年官方名义汇率（rate）进行调整。

在相关性方面，地理中心度指标反映的是该地区在国内的相对地理位置，地理中心度越高表明该地区拥有更通达的市场网络，市场发育相对成熟，该地区的消费升级水平也越高，且这一地理指标严格外生，不受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此符合工具变量的选取要求。以地理中心度与官方名义汇率的乘积作为工具变量进行 2SLS 回归，结果见表 4.7。

从 Kleibergen-Paap rk LM 检验来看，它的 p 值小于 0.05，拒绝原假设，表明所选工具变量并不存在识别不足的问题。从 Cragg-Donald Wald 检验来看，它的 F 值大于 10% 的临界值 16.38，故可以拒绝原假设，认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因此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从回归结果可知，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之后，核心解释变量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为正显著，且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对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依旧为正且不显著，该结果与前文的分析一致，表明前文的实证分析结论是稳健的。

表 4.7 2SLS 回归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CS	S ₁	S ₂
gc*rate	0.008** (2.42)		
CS		2.304** (2.17)	0.843 (1.50)
gdp	-0.052 (-1.25)	0.331** (2.07)	0.430*** (3.27)
fin	-0.021* (-1.76)	0.058*** (3.47)	0.061* (1.77)
open	0.104*** (2.96)	-0.936*** (-5.58)	0.322*** (2.92)

续表 4.7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CS	S ₁	S ₂
infr	-0.18 (-0.89)	-0.036 (-0.54)	0.446*** (5.40)
fisc	-0.002 (-0.02)	2.307*** (6.52)	0.727** (2.22)
观测值	300	300	300
R ²	0.960	0.981	0.914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Kleibergen-Paap rk LM		4.107**	4.107**
Cragg-Donald Wald F	300	16.788	16.788

4.4.3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参考刘伟等（2008）的研究方法，利用各产业产值之比与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乘积加权值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 S₁ 的替代变量，并采用均值化方法消除量纲。其计算公式为：

$$T_1 = \sum_{i=1}^3 \left(\frac{Y_i}{Y} \times \frac{Y_i}{L_i} \right) \quad (6)$$

其中，Y_i、Y 和 L_i 同式（2）。

本文参考了干春晖等（2011）的研究方法，利用泰尔指数作为产业结构合理化 S₂ 的替代变量，其计算公式为：

$$T_2 = \sum_{i=1}^3 \left(\frac{Y_i}{Y} \right) \ln \left(\frac{\frac{Y_i}{L_i}}{\frac{Y}{L}} \right) \quad (7)$$

其中，Y_i、Y、L_i 和 L 同式（2）。若该值为 0，说明产业结构处于均衡水平，若不为 0，说明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产业结构不合理。即泰尔指数值越大越不合理。结果见表 4.8。

从结果可知,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为正显著,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为正,依旧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该结果与前文主回归的结论是一致的,表明能够通过稳健性检验,前文的结论是可信的。

表 4.8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T ₁	T ₂
CS	0.294*** (1.98)	-0.096 (-1.21)
gdp	0.361*** (3.57)	-0.235*** (-4.33)
fin	0.043* (1.69)	-0.029** (-2.08)
open	0.144** (2.19)	-0.152*** (-4.33)
infr	-0.003 (-0.05)	-0.201*** (-7.57)
fisc	-0.588*** (-2.64)	-0.175 (-1.47)
观测值	300	300
R ²	0.890	0.629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2) 剔除直辖市

考虑到直辖市具有的特殊性以及政策偏向性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剔除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与重庆市四个直辖市的样本数据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4.9。从回归结果可知,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为正显著,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为正,依旧未

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该结果与前文一致，表明能够通过稳健性检验。

表 4.9 剔除直辖市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S ₁	S ₂
CS	0.972*** (4.71)	0.270 (1.25)
gdp	0.193 (1.43)	0.515*** (3.65)
fin	0.087** (2.38)	0.068* (1.79)
open	-0.029 (-0.21)	0.286* (1.96)
infr	-0.072 (-1.02)	0.516*** (6.98)
fisc	2.609*** (8.26)	0.903** (2.74)
观测值	260	260
R ²	0.856	0.652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4.4.4 异质性分析

由于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间差距比较大，可能会存在地区异质性。为考察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会受到地区发展差异的影响，本文将 30 个省份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进一步讨论不同地区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见表 4.10。东部地区的结果显示，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这说明，在东部地区，消费升级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首先，

根据前文理论，消费升级可以通过要素配置机制、技术创新机制和收入弹性机制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龙少波、丁点尔，2022），东部地区技术创新水平较高，且要素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因而消费升级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第二，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消费者对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更高需求，因而会购买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这意味着对高收入弹性商品的需求在增加。这种消费需求的变化会引导生产的变化，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中部地区的结果显示，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均不显著，但系数为正，说明在中部地区，消费环境与东部地区仍有明显差距，没有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但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与消费升级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可能是由于在中部地区，多数省份产业结构以传统制造业为主，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以及技术壁垒弱化了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影响。西部地区的结果显示，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不显著，且系数为负，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这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较为落后，传统农业比重过大，且产业间资源配置不合理，产业间关联度较弱。总之，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需要重点关注中西部地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表 4.10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异质性分析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S ₁	S ₂	S ₁	S ₂	S ₁	S ₂
CS	1.293*** (3.44)	0.371*** (3.37)	0.615 (1.15)	0.266 (0.65)	-0.229 (-0.92)	-0.889* (-1.96)
gdp	0.530 (1.32)	0.329*** (2.80)	-0.116 (-0.23)	-0.061 (-0.16)	0.352*** (2.75)	1.314*** (5.62)
fin	0.174** (2.29)	-0.050** (2.23)	-0.086 (-0.54)	-0.110 (-0.89)	0.083** (2.24)	0.192*** (2.83)
open	-0.935** (-5.15)	0.218*** (4.09)	-0.578 (-0.70)	-0.771 (-1.22)	-0.398* (-1.82)	0.106 (0.27)

续表 4.10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S ₁	S ₂	S ₁	S ₂	S ₁	S ₂
infr	-0.257 (-1.62)	0.043 (-0.93)	0.215 (0.86)	0.398** (2.09)	-0.064 (-0.91)	0.591*** (4.61)
fisc	-0.182 (-0.22)	0.218 (0.89)	4.798*** (3.83)	1.682* (1.76)	2.553*** (9.61)	0.709 (1.46)
省份固定 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 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R ²	0.865	0.618	0.865	0.618	0.916	0.765

4.5 机制检验

4.5.1 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选取高端产品销售情况（tecinc0）、高端产业就业水平（tecpeo）和产业技术创新水平（tecmark）三个中介变量来检验前文所述三大理论机制，即收入弹性机制、要素配置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参考江艇（2022）的做法，重点检验解释变量消费升级对三个中介变量的影响。因此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M_{it} = \beta_1 + \beta_2 CS_{it} + \beta_3 X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6)$$

表 4.11 检验了消费升级高端产品销售情况、高端产业就业水平以及产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第 1 列的回归结果表明，消费升级在 1%的水平上显著提高了高端产品的销售量，说明消费升级使居民增加对高端产品的需求，拉动了高端产业的发展 and 高端产品市场的繁荣，假设 1 得到验证。第 2 列的回归结果表明，消费升级在 1%的水平上显著提高了高端产业的就业水平，说明消费升级优化了生产要素的配置，促使优质的人力资源不断向高端产业转移，提高了高端产业的就业水平，假设 2 得到验证。第 3 列的回归结果表明，消费升级在 1%的水平上

显著提高了产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说明消费升级激励了厂商进行多维度的技术创新,研发新兴产品以适应需求端的变化,假设3得到验证。因此,中介效应检验结果验证了收入弹性机制、要素配置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的合理性。

表 4.11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1)	(2)	(3)
	tecinco	tecpeo	tecmark
x1	0.156*** (2.88)	0.045*** (2.89)	0.354*** (2.69)
gdp	0.159*** (4.37)	0.036*** (3.45)	0.202** (2.29)
fin	0.016 (1.71)	0.001 (0.27)	0.104*** (4.59)
open	0.097*** (3.84)	0.042*** (5.71)	0.070 (1.15)
lnfrustr	0.001 (0.03)	0.010** (2.03)	-0.184*** (-4.27)
fisc	-0.119 (-1.44)	-0.013 (-0.53)	0.057 (0.28)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00	300	300
R ²	0.438	0.322	0.412

4.5.2 调节作用检验

为验证流通效率的调节作用,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消费升级和流通效率的交互项,构建如下调节效应模型:

$$S_{it} = \gamma_1 + \gamma_2 CS_{it} + \gamma_3 tfpch_{it} + \gamma_4 (tfpch * CS_{it}) + \gamma_5 X_{it} + \mu_1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7)$$

其中, tfpch 为流通效率, tfpch*CS 为流通效率和消费升级的交互项。

结果如表 4.12 所示。第一列，消费升级和流通效率的交互项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提升流通效率可以强化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第二列，消费升级和流通效率的交互项为正，但不显著，说明流通效率尚未在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发挥作用，这说明流通效率通过增强产业拉动效应和收入弹性效应，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动作用较为明显。这也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4 和假设 5。总的来说，流通效率和消费升级水平的同步提升，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表 4.12 流通效率的调节作用

变量	(1)	(2)
	S ₁	S ₂
tfpch*CS	1.019** (2.19)	0.490 (1.16)
CS	-0.721*** (3.62)	-0.270 (1.49)
tfpch	0.020 (0.49)	-0.065 (-1.76)
gdp	0.232 (1.63)	0.418*** (3.24)
fin	0.112*** (3.13)	0.048 (1.48)
open	-0.667*** (-6.43)	0.382*** (4.04)
lnfr	-0.079 (-1.15)	0.359*** (5.78)
fisc	2.306*** (7.50)	0.341 (1.22)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70	270

续表 4.12

变量	(1)	(2)
	S ₁	S ₂
R ²	0.987	0.927

4.6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计量模型设定，接着介绍了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指标、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取。实证研究了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进行了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正相关性；消费升级可以通过收入弹性机制、要素配置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流通效率在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起到调节作用，提升流通效率可以强化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但在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的作用尚不明显。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结果和预期较为相符，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且流通效率在其中可以起到调节的作用。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对影响机制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消费升级具有正相关性。第二，消费升级可以通过收入弹性机制、要素配置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第三，流通效率对消费升级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调节作用，提升流通效率可以强化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但尚未在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发挥作用。这说明流通效率通过产业拉动效应和收入弹性效应，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动作用较为明显，能够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而对产业间的素质协调、关联方式协调等尚未发挥明显作用。第四，消费升级在东部地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较强，在中部、西部地区的驱动作用较弱。因此应重点关注中西部地区，刺激中西部更高层次消费需求，促进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5.2 政策建议

本节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刺激消费升级、提升流通效率和重视产业间的协调与平衡的政策建议。

5.2.1 刺激消费升级

第一，政府要增强消费预期，提高人们消费信心。要加强市场监管，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让消费者能够放心消费。同时，改善消费基础设施，提升消费体验，进一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还可以通过减税降费，发放消费券等方式，降低居民的消费成本，提高消费意愿。并且要鼓励和支持线

上消费、直播带货等新型消费模式的发展，提供更多元化、便捷化的消费选择。

第二，提高居民收入。目前许多消费者拥有购买意愿，但却缺少购买能力，这使他们望洋兴叹，也不利于市场规模的扩大。消费的基础在于收入，收入增加了人们的消费能力才能增加，与此同时消费结构也会发生变动，体现为追求更高层次的商品。要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劳动报酬所得，提高工资标准，让劳动报酬更加合理，使得劳动供给更加与产业发展相适应。促进就业，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鼓励创业、支持灵活就业。鼓励居民发展多元化收入，增加收入途径，鼓励增加财产性收入，积极推动乡村振兴，鼓励农民发展特色产业及旅游业等。完善社会保障，加强制度建设，特别是养老、医疗等方面，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让人们敢花钱，提高风险承受能力，从而也能更加敢于消费，提高社会保障待遇，关注低收入和弱势群体，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初次分配，多劳多得，并通过税收等再分配手段，缩小差距促进公平，在第三次分配上，倡导慈善组织等参与分配，让分配更加公平，促进共同富裕。

第三，国家要积极引导，鼓励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增强消费新动能，推动多元化消费体系的形成，在此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群体差异。

第四，要大力支持消费信贷，优化信贷政策，鼓励银行等机构加大信贷支持，例如降低贷款利率，延长贷款期限，简化审批流程，以及为绿色产业、科技创新企业提供优惠信贷政策、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信贷产品等为消费升级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也要完善信用评估体系，加强征信体系建设，减少融资风险。

5.2.2 提升流通效率

（1）真正确立流通产业的基础性与先导性地位

第一，应该摒弃过去忽视流通，重视生产的思想，深刻认识到流通产业的重要地位。第二，要意识到流通对于发展生产的重要性。流通也能够产生价值，甚至在某些角度其价值要高于生产。第三，要有系统思维，不能单独把流通环节孤立来看，而是要把其放入经济四环节的循环中，促进一种良性互动。这四个环节紧密联系、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如果缺乏整体意识，只关注其中某一个环节，无异于扬汤止沸，也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第四，流通业要与时俱进，转变经营理念，拓宽渠道，加大科技投入，运用大数据等手段提升自身实力。

（2）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不仅与经济发展有关，还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加强交通建设可以促进流通业更好经营，减少成本，提高效率，是流通体系的根基所在。第一，构建海陆空综合网络，促进各种运输方式互联互通，加强部门协同，树立系统思维。加大对中西部交通设施建设投入，补齐短板，更好促进流通体系的整体建设。重视各枢纽的流通能力建设。第二，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研发投入，利用物联网进行实时监测，运用大数据等手段深度分析交通数据，从而为交通布局提供更加合理的建议。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据可靠性和时效性，支持移动支付的发展，增强交通服务的便利性。注重人才培养，培育专业的交通行业人才，同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针对本土情况，科学施策助力交通发展。第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在交通建设过程中，必须始终牢记人民至上，紧密围绕人民群众的出行和货物流通需求，不断适应并引领其深刻变化。在新时代背景下，人民群众的出行模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出行方式逐渐被高效、便捷的新型交通方式所取代，如高铁、地铁、共享单车等。同时，货物流通方式也呈现出小批量、高价值、分散性、快速化的新特点，这对交通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要关注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出行需求，注重优化公共交通线路，提升服务质量，打造舒适便捷的出行环境；另一方面要关注小批量、高价值、分散性、快速化的货运需求，建设更多停车设施，解决停车难问题；推动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提高出行效率等。

（3）优化市场匹配机制

第一，要把能否有效实现市场匹配当作选择环节的重要标准，避免抽象地讨论流通中是多环节好还是少环节好。第二，不仅要重视有形市场，为商家与消费者打造价格低廉的交易渠道，也要优化购销关系，寻找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形成长久的合作。第三，建立大型流通集团，它具有买家和卖家双重属性，对于此类集团应出台一些优惠政策，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利用其淡储旺销的功能，可以防范国内外市场风险。第四，加大技术创新。依托大数据等先进手段对市场匹配机制进行优化。例如，可以通过算法对供需信息进行精准匹配，提高市场匹配的效率 and 准确性，降低交易成本。

5.2.3 重视产业间的协调与平衡

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不仅要关注产业的发展,也要关注产业间的协调和平衡,防止出现“短板”或“过剩”产业。这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和协调,促进产业结构的均衡发展。

(1) 优化产业布局

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地区特点,制定不同地区的发展策略。合理布局,各地区之间互帮互助、重视发展质量。例如,在国家层面,必须遵循整体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向,推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促进协调发展

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同时,要根据各地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推动产业梯度转移和区域合作,以实现各地产业和财政政策均等化、协调性,在更大范围内推动产业协调发展。

(3) 提升产业融合

产业融合是不同产业之间或者相同产业不同行业之间,通过相互渗透、交叉重组融为一体并逐步形成新产业的动态过程,主要涵盖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服务业与农业的融合、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的融合以及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融合等。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推动价值链重构和优化,催生产业全方位、多领域的革新。促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和降本降险,提升产业的生产率、附加值和竞争力,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变化的动态适配性,增强供给适应、引领、创造新需求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 Allen R G D, Clark C.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J]. *Economica*, 1951, 18(72): 432.
- [2] Fisher J, Johnson D S, Smeeding T M. Inequality of Income and Consumption in the U.S.: Measuring the Trends in Inequality from 1984 to 2011 for the Same Individuals [J]. *Review of Income & Wealth*, 2015, 61(4): 630-650.
- [3] Giles A E D. Calculating a Standard Error for the Gini Coefficient:Some Further Results* [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4, 66(3) :425-433.
- [4] Head K, Mayer T. Regional wage and employment responses to market potential in the EU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06, 36(5): 573-594.
- [5] Henri Theil.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Theory [J]. *Economic Review*, 2013,(19): 185-188.
- [6] Hirschm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M]. Economic Science Press, 1991.
- [7] Jian Y, Xunpeng S, Se T C. Distribution dynamics of China's household consumption upgrading [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21,(5): 58193-203.
- [8] Kuznets S S. Six lectures on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9,(12): 75-78.
- [9] Mine Y. The Political Element In The Works Of W.Arthur Lewis:The 1954 Lewis Model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J]. *Developing Economies*, 2006, 44(3): 329-355.
- [10] Nino-Zarazua M, Roope L, Tarp F. Global Inequality: Relatively Lower, Absolutely Higher [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17, 63(4): 661-684.
- [11] Ropke W, Fisher A G B. Clash of progress and security [J]. *Economica*, 1935, 4(13): 99.
- [12] Rostow W 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J]. Cambridge Books, 1991,(11): 256-258.
- [13] William Petty. Political Arithmetic[M]. London: 1690: 15-21.

- [14]白云朴,李辉.资源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因素及其实现路径[J].科技管理研究,2015,(12):116-122.
- [15]曹海苓.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兼论流通效率的调节作用[J].商业经济研究,2023,(07):39-42.
- [16]陈昌兵.可变折旧率估计及资本存量测算[J].经济研究,2014,(12):72-85.
- [17]陈锦然,王家荣,杨雪萍.流通业发展、国内市场一体化与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J].商业经济与管理,2022,(08):15-28
- [18]陈启斐,吴金龙.经济政策不确定性、OFDI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服务业微观企业的证据[J].世界经济文汇,2020,(04):82-101.
- [19]陈甬军,晏宗新,余曼琪.“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枢纽——粤港澳大湾区示范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2,(06):4-16.
- [20]陈中耀,李坤.消费结构升级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趋势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9,(07):174-176.
- [21]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年[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0):17-31.
- [22]丁华,丁宁.交通基础设施对商贸流通效率的影响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23,(07):28-39.
- [23]封永刚.我国商贸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驱动因素——基于中性与偏向性技术变化的全面分析框架[J].中国流通经济,2022,(10):3-13.
- [24]冯树辉,朱平芳.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异质性影响——兼论互联网商业流通效率的调节作用[J].中国流通经济,2022,(04):19-31.
- [25]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05):4-16+31.
- [26]关利欣.消费升级的国际比较及其借鉴意义[J].国际经济合作,2018,(05):25-29.
- [27]郭佳,扶涛,杨青.我国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因素分析——以云南省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5,(02):57-61.
- [28]H. 钱纳里, S. 鲁宾逊, M. 赛尔奎因.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新 1 版[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 [29] 韩永辉, 黄亮雄, 王贤彬. 产业政策推动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了吗? ——基于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J]. 经济研究, 2017, (08): 33-48.
- [30] 黄隽, 李冀恺. 中国消费升级的特征、度量与发展[J]. 中国流通经济, 2018, (04): 94-101.
- [31] 黄乾, 李竞博. 人口综合因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18, (01): 130-137.
- [32] 黄天能, 许进龙, 谢凌凌. 资源枯竭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 24 座地级市的面板数据[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08): 2065-2080.
- [33] 纪路宇, 张弘. 京津冀地区流通效率的影响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J]. 商业经济研究, 2021, (08): 162-165.
- [34] 江洪, 赵宝福. 碳排放约束下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解构、空间分布及耦合分析[J]. 资源科学, 2015, (01): 152-162.
- [35] 靖学青. 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对长三角地区的实证分析[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03): 51-55.
- [36] 孔庆景. 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基于流通业发展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J]. 商业经济研究, 2023, (06): 115-118.
- [37] 李世美, 狄振鹏. 消费升级内涵、影响因素与经济效应的文献述评[J]. 财会月刊, 2020, (08): 135-140.
- [38] 林翊, 吴碧凡. 中国省域流通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统计及空间计量分析[J]. 工业技术经济, 2017, (08): 11-19.
- [39] 刘海建, 胡化广.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与劳动力就业——基于流通标准一体化视角的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3, (10): 51-70.
- [40] 刘汝浩. 新发展格局视域下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居民消费升级协同发展——基于技术创新中介效应的实证[J]. 商业经济研究, 2021, (04): 46-50.
- [41] 刘宛晨, 胡永翔. 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 PVAR 模型[J]. 商业经济研究, 2015, (10): 56-59.
- [42] 刘伟, 张辉, 黄泽华. 中国产业结构高度与工业化进程和地区差异的考察[J]. 经济学动态, 2008, (11): 4-8.

- [43] 刘晓宇, 刘长君. 数字经济、商贸流通效率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J]. 商业经济研究, 2023, (8): 23-26
- [44] 刘子兰, 姚健. 基于 ELES 模型的大中城市消费升级研究[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05): 55-59.
- [45] 龙少波, 丁点尔. 消费升级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理论机制及实证检验[J]. 现代经济探讨, 2022, (10): 25-38.
- [46] 龙少波, 丁露, 余康. 中国式技术变迁下的产业与消费“双升级”互动机制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 2020, (10): 71-84+136.
- [47] 毛中根, 杨丽姣.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供给侧改革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J]. 财经科学, 2017, (01): 72-82.
- [48] 潘海岚, 赵培绪, 赵敏. 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J]. 商业经济, 2022, (02): 40-44.
- [49] 潘文卿, 陈水源. 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水平的定量测算——兼评甘肃产业结构优化程度[J]. 开发研究, 1994, (01): 42-44.
- [50] 潘锡泉. 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 作用机理及操作取向[J]. 当代经济管理, 2019, (03): 11-16.
- [51] 潘雄锋, 袁赛, 冯圣涵. 技术效率、环境分权与减碳降霾[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23, (04): 50-64.
- [52] 庞建刚, 李思思. 成渝双城经济圈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时空耦合及影响因素[J]. 科技管理研究, 2023, (02): 101-111.
- [53] 祁艳艳, 孙雅平, 刘媛媛等. 基于 var 模型的沧州市居民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互动关系[J]. 商场现代化, 2022, (20): 7-9.
- [54] 石明明, 江舟, 周小焱. 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 (07): 42-60.
- [55] 宋则, 常东亮, 丁宁. 流通业影响力与制造业结构调整[J]. 中国工业经济, 2010, (08): 5-14.
- [56] 孙畅, 吴立力. 长江经济带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行业异质性的实证研究[J]. 管理现代化, 2017, (01): 29-32.
- [57] 孙豪, 毛中根, 王泽昊. 消费降级: 假象及其警示[J]. 经济与管理, 2020, (03):

- 19-26.
- [58]王东京. 筱原的基准[J]. 决策咨询, 2000, (07): 34-35.
- [59]王明雁, 王静文, 祝合良. 中国流通业集约化水平的测度及空间特征[J]. 中国流通经济, 2021, (5): 19-28.
- [60]王玉梅, 龚长兰. 商业模式更新在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中的传导效应[J]. 商业经济研究, 2019, (9): 173-176.
- [61]魏滨辉, 罗明忠, 曾春影. 劳动力返乡创业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线索与经验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 (10): 26-48.
- [62]魏勇, 杨刚, 杨孟禹. 城镇居民消费升级特征与动因研判——基于空间溢出视角的实证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17, (01): 51-63.
- [63]吴敬琏.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增订版)[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8.
- [64]武晓霞. 省际产业结构升级的异质性及影响因素——基于1998年~2010年28个省区的空间面板计量分析[J]. 经济经纬, 2014, (01): 90-95.
- [65]谢莉娟, 武子歆, 万长松. 流通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3, (08): 32-45.
- [66]徐卓顺, 赵奚, 夏海利.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的影响[J]. 社会科学战线, 2022, (03): 250-254.
- [67]严金强, 武艺扬. 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与实践路径——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四环节”理论框架[J]. 上海经济研究, 2023, (06): 53-67.
- [68]杨天宇, 陈明玉. 消费升级对产业迈向中高端的带动作用: 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J]. 经济学家, 2018, (11): 48-54.
- [69]杨向阳, 汪洁, 刘备. 中国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地区差异与动态演进[J]. 经济纵横, 2023, (07): 87-99.
- [70]依绍华. 从发达国家消费发展规律看中国消费变化走势[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8, (10): 26-28.
- [71]俞剑, 方福前. 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5, (05): 68-78.
- [72]袁小慧, 范金, 王凯等. 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居民消费升级对中国产业转型影响研究[J]. 新疆社会科学, 2015, (06): 12-18.

- [73]张俊英, 邹红, 栾炳江. 当前我国到底是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J]. 中国民族博览, 2019, (11): 116-120.
- [74]张敏, 李艳. 数字经济对商贸流通业效率的影响——兼论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中介机制[J]. 商业经济研究, 2023, (18): 19-22.
- [75]周昌林, 魏建良. 产业结构水平测度模型与实证分析——以上海、深圳、宁波为例[J]. 上海经济研究, 2007, (06): 15-21.

后 记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一晃而过，回想这三年的经历，有欢笑也有心酸，有遗憾也有满满的回忆，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清楚。我最想感谢的一个人，就是我自己。感谢我没有辜负当初考上研的自己，感谢我在灰暗痛苦的时候没有放弃，完成了三年的学业，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写作。正如那句话所说，轻舟已过万重山。在这三年我学到了很多道理，比如，先完成再完美。我是一个有拖延症的人，做事之前也会想很多，担心自己做不好，很焦虑，久而久之就会越来越不敢去做，但是这句话让我豁然开朗，减轻了我的很多焦虑。三年的研究生生活更多的是磨炼了我的心性，让我变得更加成熟，变成了一个更好的自己。还有我的家人，是他们一直在背后支持我，鼓励我，给予我莫大的勇气和信心，让我能够继续前行。最后我想说，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研究生的旅程即将驶向终点，该收拾行囊，踏上旅途，奔赴下一场山海。